

古代文史
名著选译丛书

宋
元
明
清

巴蜀书社

译注 张艳云 段塔丽

审阅 黄永年

日知录选译

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

日知录选译

(川)新登字008号

责任编辑：何 锐

封面设计：陈世五

●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

日知录选译

张艳云 段塔丽译注

巴蜀书社出版发行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

内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960毫米 1/32

印张10.125 字数160千

1994年7月第一版

1994年7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5000 册

ISBN7-80523-637-2/Z·79

定 价：140.00元(第三批35种)

张艳云

段塔丽

黄永年

国家教委古籍整理
『七·五』规划重点项目



顾炎武像

日知錄集釋卷一

崑山顧炎武著

嘉定後學黃汝成集釋

三易

夫子言包羲氏始畫八卦不言作易而曰易之興也其於
中古乎又曰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
王與紂之事邪是文王所作之辭始名爲易而周官大卜
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連山歸藏非
易也而云三易者後人因易之名以名之也雷氏曰伏羲
畫卦自兩儀
生四象而四
時之序已著
自四象生八
卦而萬物之
理悉函自八
卦重之相錯
相盪陽動而
進左旋而位
于西北陰動
而退右轉而
位于西南于
是震兌正于
東西坎離正
于南北而四
時首春帝出
乎震之象以
立又以乾元
用九消息之
而十二辟卦
之象以成六
十四卦之象
以著伏羲氏
之所以爲易
者也連山者
神農氏之易
也神農詳于
地辨

序

《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与广大读者见面了。这是丛书编委会的同志与众多专家学者通力协作、辛勤耕耘的结果。

中华民族在五千年漫长的岁月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给人类留下了丰富的精神财富。“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今天，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为指导，整理研究我国古代文化典籍，做到汲取精华，剔除糟粕，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使人们在正确认识民族历史的同时，得到爱国主义的教育，陶冶道德情操，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使文明古国的历史遗产得以发扬光大，这是我们每个炎黄子孙的责任。而要做到这样，对古籍进行整理与研究是重要的基础工

程。但是，整理与研究古籍仅作标点、校勘、注释、辑佚还不够，还要有今译，使老年人、中年人、青年人都愿意去读，都能读懂，以便从中得到教益。

基于以上认识，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于一九八六年五月组成了以章培恒、安平秋、马樟根三位同志为主编的《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编委会，确定了以全国十八所大学的古籍整理研究所为主力承担这一看似轻易、实则艰巨的今译任务。在第一次编委会议上，拟定了《凡例》《编写与审稿要求》、《文稿书写格式》和一百余种书目。以每一种书为十万至十五万字计算，这套丛书大约有一千余万字，应该说是一项大工程。经过一年的努力，完成了第一批三十六部书稿的译注任务。在各研究所的专家与所长把关的基础上，于一九八七年五月和七月，先后在复旦大学、北京大学召开了部分编委参加的审稿会，通过了二十五部书稿，作为《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与广大读者见面的第一批作品。与此同时，在一九八七年七月六日，邀请了在京的十几位专家教授与编委会十几位编委一起座谈这套丛书与古籍今译的问题。专家们肯定了今译工作的必要性与深远意义，并以他们数十年的教学科研和创作的经验，说明今译是一项

难度很大的工作，是培养人才，使之打下坚实基础功的一种有效方法；专家们还对《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提出了宝贵的建议，这对当时的审稿工作和保证《丛书》的质量起了很好的作用。

实践证明，古籍的今注不易，今译更难。没有对作品的深入、透彻的研究，没有准确、通俗、生动的语言表达能力，要想做好今译是不可能的。两年多来，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在探索古籍的今注、今译的道路上，做了一些工作。这部丛书的出版，是系统今译的开始，说明古籍整理研究工作有了新的进展。更可喜的是，一批中青年学者参加了今注今译工作，为古籍整理增添了新生力量，相信他们会在实践中，在学习，中成长成熟。我希望，这套丛书的编委会和高校各古籍整理研究所要敞开大门，加强同国内外专家学者的联系，征求他们和广大读者的意见，并向有真才实学而又适宜做今译工作的专家学者约稿，以提高古籍译注的水平，使《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的第二批、第三批作品的质量更上一层楼。

这是一套以文史为主的大型的古籍名著今译丛书。考虑到普及的需要，考虑到读者对象，就每一种名著而言，除个别是全译外，绝大多数是选译，即对从该名著中精选出来的部分予以译注。译

文力求准确、通畅，为广大读者打通文字关，以求能读懂报纸的人都能读懂它。我希望这套丛书能成为中小学教师、语文、历史教学的参考书，成为大专院校学生的课外读物，成为广大文史爱好者的良师益友。由于系统的古籍今译工作还刚刚起步，这套丛书定会有不少缺点、错误，也诚恳地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巴蜀书社要我为这套丛书写序，我欣然接受了。我相信这套丛书不仅会使八十年代的人们受益，还将使子孙后代受益，它将对祖国的繁荣昌盛起到点滴的作用。最后借此机会向曾给予我们支持、帮助的专家学者和巴蜀书社的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并殷切地希望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海外侨胞和我们一同做好祖先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的整理工作，为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再放异彩而努力！

周 林

一九八七年十月于北京

前 言

明清之际，是我国历史上的大动荡时代。阶级矛盾的激化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从天启七年（1627）开始到崇祯十七年（1644），仅仅经过十七年的战斗，闯王李自成就打进了北京。紧接着山海关外的满族小皇帝清世祖福临和摄政王多尔袞率军入关，打败农民军占领北京，继而着手消灭明朝的残余势力，使满汉之间的民族矛盾又一时上升为主要矛盾。这对站在明王朝封建政权立场上，不愿与“入主中原”的清王朝同流合污、醉生梦死的知识分子来说，总结这段大动荡的教训，提出种种从学术到政治上的新见解新设想，就成为落在他们身上的历史重任。于是他们中间有不少人成了著名的思想家、学问家，写出了至今还闪耀着光辉的著作。

我们在这里选译的《日知录》及其撰著者顾炎武，就是其中最具有影响的代表作品和最杰出的代表人物。

先介绍顾炎武的生平。他是明朝万历四十一年（1613）出生的，家在现在的江苏昆山，就明朝的地方行政隶属来说是南京的苏州昆山。这一带处长江下游三角洲，宋元以来就是我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又是学术文化领先的地区。顾家世代读书做官，曾祖顾章志曾贵为明朝的南京兵部侍郎。顾章志有两个儿子，长子绍芳生子同德、同应，同应生有五子，其中第二子就是顾炎武，当时名绛，字忠清，明亡后才改名炎武，改字宁人，还曾化名叫蒋山佣，学者则称之为亭林先生，因为他家乡有个地名就叫亭林。他的堂叔、也就是顾章志次子绍莘的儿子同吉还未成婚就去世，未婚妻王氏自愿到顾家当绍莘的儿媳妇，并经同意把顾炎武领过来作为儿子。这位嗣母王氏很有文化，能读《史记》和《资治通鉴》，对顾炎武尽心教导，使顾炎武从小就博览群书，通读《二十一史》和明十三朝实录。不过他在科举道路上并不得意，十四岁时取得一名秀才后再不曾有所进展。到南明弘光元年（清顺治二年，1645）他三十三岁时清兵南下，版图易色，他便过起了另一种带有传奇性的生活。

在弘光朝，顾炎武本已应征在兵部做了个小小的司务厅司务，清兵进入苏州府时顾炎武就参加了当地的抗清武装斗争。昆山失陷，顾炎武的四弟、五弟都被杀害，生母何氏也被斩坏臂膊，嗣母王氏绝食自杀，临死时教顾炎武不能做清朝的官。顾炎武严遵母命，继续抗清。他接受了隆武帝的任命，要去福建就任兵部职方司主事，因道路不通未去成。不久隆武帝又被清兵杀害，顾炎武只得在长江下游地区徘徊了十年之久，其中曾六次到南京拜谒明太祖的陵墓。到顺治十四年（1657）他四十五岁时，认为在南方已没有活动余地，就离家北上，在苏北、山东、河北、山西等地又活动了二十个年头，其中又曾六次拜谒明思宗的陵墓。这时他在南方的家早已破了，但他会理财，每到一处就垦田，垦好了交给朋友或门生去经营，据说苏北的淮安、山东的章丘、山西的雁门之北和五台之东都有他垦田的遗迹。清康熙十六年（1677）六十五岁时他到陕西的华阴定居，康熙二十一年（1682）他七十岁时在华阴逝世。

从家乡被清兵攻占到他逝世前后三十多年中，他究竟干了多少秘密的反清活动，今天已无从知悉，但他因而两次被清政权追究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一次是北行之前，有个顾家的家奴名叫陆恩的

要陷害顾炎武。家奴者即是家内奴隶，本属于被压迫阶级，但其中很有些在改朝换代时期竟投靠新主子来陷害思故国的旧主子。陆恩就是这样的坏蛋，看顾家不行了，转而投靠姓叶的地主豪绅，还控告顾炎武“通海”^①，顾炎武将此人抓起来丢进水里溺毙。陆的女婿又通过清朝地方政权把顾炎武囚禁起来，亏得顾炎武的友好多方活动才得脱身。再一次是北行之后，被牵连进山东发生的一件文字狱里，顾炎武只好亲自到济南去辩解，被下狱关了半年多，还是靠了友人帮忙才获释。可他仍旧不肯屈服，康熙十七年（1678）要动员明朝的遗老出山考博学鸿儒科，顾炎武并不理会，并叫他的门生传话：“刀绳俱在，无速我死！”第二年清政府又开《明史》馆，要请顾炎武出山修《明史》，他答复道：“七十老翁何所求，正欠一死，若必相逼，则以身殉之矣！”这时他已德高望重，清政府自然对他无可奈何。

坚贞气节保持了，可还有精力和时间来研究学问吗？几十年到处奔波，还能从事著作吗？能。不仅能，而且正凭这几十年的奔波阅历，才使顾炎武留下的著作更加有光彩。要知道，封建时代的文人

^①通海：当时和东南沿海抗清势力有往来的都被称为“通海”，是一个很大的罪名。

有个通病，即只知道读死书，死读书，除了书本知识之外对实际生活可以说一无所知；同时所谓学问也停留在书本上，纸面上，有没有实际用处也可以不予考虑。顾炎武则不是如此，他认为研究学问是为了切合实用，因此决不能停留在书本上，而要和社会实际相结合。在旅途之中他经常是两匹马换着骑，两头骡子驮着书籍，每到险要之处，就找些老兵退卒，询问曲折，发现和平时所闻不合，便打开书来查对，所以他的学生潘耒说他对“山川风俗疾苦利病，如指诸掌”。他生平一共撰写了三十多种著作，很大部分是这种严谨治学风格的产物。

在这些著作中，最有价值的应该是《天下郡国利病书》。他从二十六岁起看了一千多种书，把有用的材料抄录下来，用以撰写这《天下郡国利病书》和另一部《肇域志》。《肇域志》讲地理，《天下郡国利病书》讲各个地区的利弊。可惜都没有写成，只留下几十册初稿。《天下郡国利病书》的初稿曾在本世纪30年代影印。已经定稿并在生前就刊行享有盛名的是《音学五书》，主要讲古代汉字的读音和今天有什么变化，为古音研究奠定了基础，在学术上有很高的地位，却不好说是“经世致用”之著。但这几种书的影响都比不上《日知录》，《日知录》是一部既考虑到实用而又有极高学术价

值的大著作。

这部大著作从卷数来说倒不算多，康熙九年（1670）第一次刊刻的本子只有八卷，他身后，学生潘耒在康熙三十四年（1695）刊刻的足本也不过三十二卷，可撰写起来真不容易。这是一种读书札记形式，写这种札记首先要会“抄书”，也就是能从大量书籍文献中选抄出有用的材料。顾炎武把他撰写《日知录》比作铸钱，当时通用的圆形方孔钱要用铜来铸造，他认为自己要像从矿山里采来铜然后铸钱一样著书，也就是说直接从书籍文献里采用材料来著书，不像有些人写书只把别人的著作改头换面乱抄一通，好似买来旧钱毁掉来铸新钱。在《日知录》的初刻本前面顾炎武写上这样几句话：

“愚自少读书有所得辄记之，其有不合时复改定，或古人先我而有者则遂削之，积三十余年，乃成一编。”在这以后有人问他《日知录》又写成几卷，他说在一年中“早夜诵读，反复寻究，仅得十餘条”。说明这种采铜于山的工作是何等艰巨。《论语》的《子张》篇里记载孔子学生子夏的话：“日知其所亡^①，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矣！”正好体现了顾炎武这种求知精神，所以顾炎武把他

^①日知其所亡(wú)：亡通“无”，意思是每天都要弄懂他所不懂的东西。